

让千年忠义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关帝诞辰1865周年系列活动今启幕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 今明两日,关帝诞辰1865周年系列活动将在常平家庙及周边区域隆重启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关帝信仰复兴,常平关帝家庙逐步恢复相关纪念活动。早期活动以信众自发朝拜为主,形式相对简单。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乡镇政府、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单位等相继参与主办,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益丰富,影响力逐年提升。

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此次关帝诞辰1865周年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也是推动关公文化惠民的具体实践。活动主题为“关帝庆诞传忠义 时代赋能铸春秋”,将通过谒拜或祈福朝拜、关帝巡乡里、戏剧演出、关公文创展、关公信俗展、庙会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关公文化魅力,展现关公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关公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7月17日上午8时,常平庙会开幕式暨关帝巡乡里将在常平关公文化广场启动。活动以开幕式为起点,随后举行的“关帝巡乡里”仪式还原传统民俗场景,巡游队伍会沿忠义街行进,同步开展关帝信众家庙朝拜、社火表演等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内核。

9时起,关公文创展、关公信俗展将在常平关帝家庙东西廊坊开展。展览通过文创产品、民俗文物等实物展示,结合图文介绍,系统呈现关公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创新,展示其精神内涵与传承脉络。

9时58分,古树名木认养仪式会在常平家庙崇宁殿前举行。签订认养协议,凝聚社会力量参与古树保护,既守护千年古树生态底蕴,也以“生态+文化”的方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11时,开台戏将在常平关帝家庙仪门上演,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蒲剧演出一团带来经典蒲剧表演,以非遗戏曲艺术为活动添彩;20时,该演出团在常平关公文化广场再次上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

此外,17日23时30分至18日凌晨2时,常平关帝家庙开放进香祈福活动,信众可有序进行自由朝拜,在庄重氛围中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关帝诞辰正日,当日8时58分,祈福朝拜活动将在常平关公文化广场、常平关帝家庙举行。仪式严格遵循传统礼制,以“三献礼”为核心流程,邀请嘉宾与信众共同参与,通过规范的仪轨传承谒拜文化,表达对关公精神的尊崇。

10时,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蒲剧演出一团将在常平关公文化广场再次献上戏剧演出;10时18分,赐福赐粮活动将在常平关帝家庙四亩地启动,现场发放1865碗“关帝长寿面”,以“长寿面”这一传统意象传递祝福。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满楠

关公忠义文化生成与传承漫议

■李云峰

一年一度的关公诞辰祀典(农历六月二十四)即将来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一同探究关公文化的由来、内涵与趋势。

关公忠义文化的根基,在山西省运城市,也是运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系列主题文化节当中的醒目招牌。2025年7月9日,市委书记储祥好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挖关公故里文化富矿,统筹做好保护传承、研究阐释、宣传普及、文商融合、传播交流等工作,全面叫响做实擦亮关公文化金字招牌,为运城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动能。”关公文化旅游节,自1990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5届,参与活动的嘉宾,来自国内外海外、五湖四海。从历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交流活动盛况中,可以感知关公忠义文化千秋不辍、历久弥新的勃勃生机。

关帝祖庙,坐落在中心城区西南约40里的盐湖区解州镇,南面是峥嵘耸翠的中条山,北接银镶玉砌的西塬湖(硝池滩),总面积1.8万余平方米,主要分南北两大部分。南为结义园,北为主庙,其中主庙又分前后两大院落,前部为庙堂大殿,后部为寝宫,庙貌宏敞,堂皇富丽。这种布局,在全国所有关帝庙中实属罕见。早在明代时,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汤沐在拜谒关帝祖庙后,发出“四海只今多庙貌,英灵还属旧河东”(见《谒关帝庙》)这样的赞吟。

关圣帝君,来历与其他影响力广泛的神祇迥然不同,诚可谓千古无双。民间敬奉的神明,不是天神地祇,就是民族始祖。前者源自远古先民对大自然的敬畏,演化成后世众多的神仙;后者则是口碑相传的,对策略蓝缕、薪火相继开创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先祖的追慕、崇敬与纪念性的神化形象。而关圣帝君,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历史人物。古代因功封神的历史人物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偏偏只有关羽身后获得如此显赫声名?理由很简单,就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忠义精神。

关羽的忠义精神,源自他生前对忠义品行的践行垂范。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所载,关羽自河东解县举义命河北涿郡,结识胸怀救世抱负的刘备和张飞。刘备待他与张飞“夜则同床,恩若兄弟”,自此二人便忠心耿耿,“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是三人忠义之始。而后曹操东征刘备,挟归关羽,壮其为人,“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关羽却对试探的张辽表明心志:“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当关羽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被曹操表封为“汉寿亭侯”之际,获知刘备下落,遂“尽封其所赐,拜书告

辞,而奔先主于袁军”。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这样言明曹操对关羽敬重的态度:“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追追以成其义。”英雄豪杰惺惺相惜,也进一步推升了关羽的忠义品格。随后关羽追随刘备经历艰难困苦、辗转腾挪,并独当一面于荆州前线,北攻中原,威震华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关公基金会学术委员田福生刊于《关帝庙》内刊的《义薄云天关云长》中,还记述了这一时期一则体现关羽忠义不二品质的故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军包围曹仁,渔民献上象征皇权的“灵光彻天”玉玺,关羽当即献给刘备。直至遭孙权与曹操合谋算计,樊城不取,败走麦城,拒降遭虏,从容就义,从道德人格上完成了关羽忠义精神的升华。

再结合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还有后世《解梁关帝志》以及民间诸多传说故事等对关羽生平事迹的丰富,可以得知关羽出生于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少时习读《左氏春秋传》,传为铁匠出身,早年在家乡解梁城因路遇不平、见义勇为,打死恶霸熊员外被迫逃离家乡。这一义举被后人广为传颂,而后他亡命河北,和不打不相识的张飞、招兵买马的刘备“桃园三结义”,立志救国家于危难,成为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推崇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榜样。刘备兵败逃走,关羽为保皇嫂安危,以降汉不降曹的不屈姿态暂归附曹操。虽然得到看重,封赏不断,但是一旦闻知刘备音讯,他当即封金挂印、挑袍灞桥、绝尘而去,并历经过五关斩六将的生死坎坷,终与刘备、张飞重逢古城,其忠义不二的形象,感人至深。再加上经过文学艺术加工、更加生动感人的兵败被俘、忠贞不二、大义归天等悲壮情节,进一步凝聚确立了后世关公精神的忠义核心。

忠义精神让关羽享誉身后,口碑相传于民间;隋时,盛传关羽玉泉寺显灵关羽灵迹;唐时,关公显圣的传说流布更广;五代时,各地已盛行关羽像(见《益州名画录》);北宋时,京城与地方勾栏瓦舍“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人物,已经具备了《三国演义》里关羽关云长艺术典型的雏形……

也正是在民众对关羽忠义精神自发信仰的大背景下,帝王往往选择顺应民意,借助民众与士大夫热捧的忠义精神化身——关羽形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教化臣民。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命张天师请来已成为道界神人的关羽敕凿尤,以化解河东盐池歉收之困,维护赵家王朝选择推崇人文始祖黄帝的权威性,由此实现了关羽与宗教、神权的合体。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可能觉得有点荒唐,但是在神道设教的旧时代,并不奇怪。宋徽宗时,由“忠惠公”到“武安王”再到“义勇武安王”,不断提升关羽的敕封规格,并开启敕命修建关庙之风,把关羽忠义精神崇拜由民间升格到官方主导

的高度,由此开始了由朝廷神化关羽的非凡历程——元文宗敕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敕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世祖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圣祖亲临解州关帝庙拜灵匾,拨款重新修缮毁于大火的大部关帝庙建筑;清德宗作出了最后多达26个字的敕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谓登峰造极。可以说,关义文化植根于儒家,升华于佛家,鼎盛于道家,认可于皇家,推广于大家,故而企及“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共尊的神圣地位。

与敕封同步提升的,是对关羽祭祀规格不断提升。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改关羽自唐德宗以来的配享身份为专祀主位,每年五月十三日,皇帝派遣朝廷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前往关庙祭祀。沿袭明朝崇祀制度的清朝,至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颁定直隶各省祭祀关帝的制度,京师增加春秋二祭,变原来的一年一大祭为一年三大祭,关帝祀典礼仪规格达到极盛,关羽由此完成了“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由圣而天”的成神之路。

随着关羽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超乎寻常的提升,清代后期,全国出现了村村皆有关帝庙的空前盛况。庙宇是集造型、建筑、雕塑、美术、楹联、牌匾、碑文等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形态,封建社会统治者修建关帝庙的用意,就是要让关羽也像孔子那样,成为人们敬奉、学习的榜样。

此外,关羽除了“关帝”“关圣帝君”的神号,老百姓也称呼送子娘娘、土地爷的亲 and 口吻,称呼他为“关老爷”;文人学子则依照志书文献和文艺作品里的称谓习惯,约定俗成地敬称他为“关公”。

回顾过往,关公身上体现出来的忠义精神有两大特色:一是忠于朝廷与忠于刘备的高度统一,二是心志忠诚的坚贞不二。所以历代皇帝在对关羽的20多次敕封中,“忠义”二字至少有8处。其中清世祖顺治和清德宗光绪都把“忠义”置于封号首位。就连东吴孙权,也曾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追赠关公为“忠义侯”。无独有偶,清高宗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特意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封谥,应改为‘忠义’。”

解州关帝祖庙第一道牌楼式的端门上方,一边是“精忠贯日”,一边是“大义参天”,“忠义封号”题匾明彰。辛亥元老于右任先生以一副对联对其进行了生动诠释:“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由运城学人提出的“关公文化”理念,经过孟海生、杨明珠、柴继光、王西兰等

一大批关公文化专家学者几十年接力,并以《人·神·圣关公》《武圣关羽》《不朽关公》《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等丰富著述,把具有上千丰厚积淀的关公文化研究推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层次、新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关注和研究关公文化现象的学者和作家笔下,既认可仍弘道神坛作为精神信仰的关圣帝君,也欣赏被呈现在戏曲舞台、文艺作品、美术绘画以及民俗工艺美术表现形态当中的关公形象,一并作为自己研究探讨的对象,诉诸笔端,经营成文,著述成书,汇聚成一个蓬勃活跃的关公文化发展形态。而这个活态的关公文化可以提炼凝聚起来的题旨与意义,那就是值得继承、吸纳、学习、发展的关公道德品格与精神内涵——忠、义、仁、勇,其对国以忠诚、待人以信义、处世以仁爱、作战以英勇的核心要义,便是“忠义精神”。既然关公被历代视为“忠义之神”,关公精神被称为“忠义精神”,那么关公文化自然也就可以称为“忠义文化”。而且从关公文化发展脉络来看,关公文化早已超越时空,超越民族、超越国度、超越地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那么应该如何认知、辨析作为民族信仰的关公忠义文化,并与与时俱进地予以全新诠释、弘扬光大?

古往今来,君子形象是以道德理想为目标的人格表率,是德行高洁的象征。关公作为君子人格的典范,大丈夫风范的标杆,其忠义精神、神武气概,一直被重品德重修为的华夏子孙所崇尚、膜拜,展现其人格之美的各类作品因而流传千古,成为鼓舞中华儿女志气气节、砥砺人格、奋发图强的力量源泉。现在,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关公忠义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

所以,要去粗取细、去伪存真,摒弃封建时代愚忠桎梏等糟粕,弘扬关公践行春秋大义的气概和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英雄本色,倡导忠诚担当、正直守信、仁爱互助、济困扶危、见义勇为等优良品质。通过挖掘关公文化的忠义特质和时代价值,并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社会良好风尚,更加注重弘扬关公文化的道德伦理内涵,倡导“以义制利”的正确“义利观”,在全社会再塑“重诺守信”的商业伦理;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当中的传承,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接受关公文化,进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入新时代,不能只从理念上理解和宣传关公的“忠义精神”,而要把挖掘出来的关公忠义精神,切实践行于为实现中国梦而付出的努力中。

首先,关公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海内外华人聚居的区

域,大多遗存或新建有关帝庙,人们把崇敬关公忠义精神作为凝聚合力、团结共赢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其次,关公文化已被整个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对海内外华人华侨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也是联结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再者,关公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是联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纽带。所以,以解州关帝祖庙富有成效的工作特色为例,从中感知他们如何以继承、探索、突破、创新的姿态弘扬关公忠义文化精神——

每年坚持举办关帝巡城(农历四月初八)、关帝诞辰祀典(农历六月二十四),和以金秋大祭带动起来的关公文化旅游节三大关公主题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关帝祖庙的三张颇具号召力与权威性的关公文化宣传品牌。

每年关公文化节期间,组织举办多场次、形式多样的主题论坛和研讨活动,在理论层面不断引伸、提升关公文化的认知层次和思想深度,为构架宏大的关公文化体系作出贡献。

应东南沿海福建、台湾等省市关庙单位的邀请,祖庙已经连续数十年组织“关帝巡游”活动,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增强了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促进了两岸民众相知、相融、相亲,成为宣传、交流关公忠义文化、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力量量的亮丽品牌。

与各地关庙建立密切交流、学习互动的联系机制,授牌关公文化宣传基地,促进关公文化发展;还应邀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当地的关帝庙文化交流活动,有序推进关公文化国际化的进程。

与台湾漫画大家蔡志忠合作,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拍摄动画电影《武圣关公》;与国家、省、市文艺团体合作,创作演出《忠义千秋》《关公颂》等文艺剧目和交响乐作品,都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发挥馆藏优势,举办“忠义神武——解州关帝庙藏历代关公文物珍品特展”,并应邀安排外出巡展,达到良好的宣传展示效果。

组织专家团队,开启系统编纂《解州关帝庙志》的浩大工程,这是关帝祖庙迄今为止第一次系统搜集、整理、研究、编撰、出版完整的庙志,将会从史料层面为弘扬关公文化提供最为有力的支持。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碑刻通记卷》上下册、《器物题铭卷》上下册和《楹联牌匾卷》。

创办以关公文化为主题的季刊《关帝庙》,至今已编辑出版14年,始终坚持“联谊天下关庙,团结全球信众,弘扬关公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办刊宗旨,已经成为与海内外兄弟关庙联系的纽带和宣传交流的平台……

作为拥有最丰厚关公忠义文化资源的运城人,我们应该通过生动具象化的场景呈现、富有建设性与理论高度的文本著述,推动关公忠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文化自信,更好地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信伴随着关公文化在海外持续升温与兴盛,以及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人具有崇敬关公忠义精神、人格品德优秀的群体汇聚壮大,全社会必将进一步迸发出无穷尽的精神力量与推动力。

将士;可以代替君主出征,但绝对不可以未经君主允许私自带兵出战的,这在古代等同于谋反。因而关公北伐襄樊出战曹军,一定是奉刘备之命的。

同时,刘备远在西川,救兵一时难以到达,但友军刘封、孟达袖手旁观,刘备也未令其出兵,关公孤军作战,纵有三口六臂,也是必败无疑的。因而讲,刘备发动北伐伐襄樊曹军之战,准备是不足的,决策是失误的,失败是必然的,刘备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其次,驻扎于公安屯守傅士仁,是刘备的幽州老乡,为早年追随刘备的元老将领。驻扎于南三郡太守糜芳,是刘备的二舅哥,姻亲关系,也是刘备军初创骨干。驻扎于东三郡上庸守将刘封,是刘备的义子,跟随刘备也10多年了,可谓蜀汉军中年轻大将。孟达是当年刘备进攻益州暗中内应人员,可为刘备亲近大臣。然而,刘备身边的这些部将大臣们,由于个人恩怨、权力争斗和利益冲突,使得蜀汉军中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甚至冒犯“军令”投降叛变。作为蜀汉军最高统帅,刘备选人不当,用人失察,甚至任人唯亲,后果是极其惨痛的。

荆州失守,也并非必然。如果刘备让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与庞统的见解一并采纳,相互统筹;如果关公没有遇到东吴的偷袭和糜芳、傅士仁的背叛以及刘封、孟达的不予相救;如果关公不是孤军南下退到麦城,而是撤军上庸会合刘封、孟达,等待刘备援兵或指令刘封、孟达相救,或许战事还有转机。但历史却不容假设。

“此城吾镇,不可攻也”,便是关公“善待卒伍,有国士之风”的行为表现。想荆州、爱荆州、惜荆州、还荆州、夺荆州、守荆州,是关公与蜀汉军的最大努力和付出。危机时刻,关公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而把老百姓的安危和荆州的守护挂在心上,这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大义”,或许这也是关公一生秉承“忠义”的付出或代价,以及《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评价“义绝关公”的动因或支撑。

荆州失守非是关公“大意”

■关新刚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存在重大错误。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诸葛亮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这是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对刘备所说的。简单地来说,诸葛亮认为,荆州北连汉中,南接益州,东连吴国,西接巴蜀,四通八达,位置优越,拿下这块地方,就可以构筑犄牛鼎足之势,继而联合东吴攻打曹魏,图取中原。

诸葛亮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刘备占领荆州后,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然庞统却有不同看法。《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记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殍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借以定大事。”庞统告诉刘备,荆州虽繁荣富庶,但却在其后的赤壁大战中,已成为一块民生凋敝的荒废之地,不利于当作根据地,并且荆州还是一片让曹操、孙权都相当眼红的地盘,要想长期拥有荆州,不仅要防御江北的劲敌,更要提防江东的强盗,甚至江东的强盗要比江北的劲敌威胁还要大,因而诸葛亮《隆中对》战略中提出的“东和孙吴”是靠不住的。应该全力入蜀,尽快攻下西川(也称益州,现为成都),以西川为根据地才是万全之策。

事实证明,庞统的认知和分析,高屋建瓴,恰如其分,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确实存在失误和不当。

二、留守于公安守将傅士仁、荆州部

将糜芳不予抵抗,甚而投降叛变,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二个原因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正当关公率军在襄樊激战时,盟友吴军白衣渡江,偷袭荆州,留守于公安、荆州的傅士仁、糜芳,打开城门相迎,不战而降。

这两位部将投降叛变缘由,史料记述,襄樊之战开始后,蜀军后勤补给不足,导致战事陷入僵局,关公曾命傅士仁和糜芳给前方运送军资,但二人消极怠慢,关公大怒,言明“还当治之”。他俩害怕关公“军法论处”,便在吴军偷袭时,临阵倒戈叛变。尽管后来糜芳和傅士仁因投降感到后悔,杀了吴将马忠回归刘备,最终还是未被刘备原谅而斩杀。

蜀汉部将的叛变行为,千古唾弃。四川绵竹城南关帝庙前,曾置有“蜀汉三叛”糜芳、傅士仁、郝普的明代跪像。

三、占据东三郡上庸的友军刘封、孟达,面对关公求援不予相助,甚而见死不救,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三个原因

《三国演义》记述,襄樊之战中,荆州危机,赵累向关公谏言: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益州求救,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关公采纳了赵累主张,派遣马良、伊籍和胥文三人星夜赶往益州求援。《三国演义》还记述,麦城困围,关公派廖化突围至东三郡上庸(现湖北竹山县西南),向友军刘封、孟达求援,结果无功而返,归途中被孙吴军擒获。

而正史记载:关公水淹七军取得大胜后,曹

仁不仅没有放弃樊城,反而还多次击退了蜀军攻势。尤其是曹操派遣徐晃大军增援后,关公感到压力巨大,于是向刘封、孟达求援。就在襄樊之战告急,荆州危机,关公“连呼”刘封、孟达多次中,他们总是借以上庸各地刚刚平定,不能轻易离开为由而拒绝。

求援无望,关公只得将留守于荆州城的大部分兵力调到前线,从而造成后方防守空虚,吴军有空可钻。在此,文艺作品为渲染主题,将关公向刘封、孟达求救,放在了困守麦城之中。

至于刘封、孟达拒不出兵原因,《三国演义》记述,当时孟达不满刘备对自己的封赏,借以关公极力反对刘备接收刘封为义子缘由,挑拨刘封和关公的关系,使得刘封非常嫉恨关公,所以在长达半年时间的襄樊之战(219年7月—219年12月)中,直至荆州危机、麦城失陷,关公及其子关平、都督赵累临沮遇害,刘封、孟达始终没有出兵一兵一卒。

四、最高统帅刘备对当时的战局研判和人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和考量,应是痛失荆州的第四个原因

首先,就在刘备对东吴防御逐渐松懈时,东吴正在和曹王暗中勾结,共同谋划联盟伐蜀。而此时刘备在西川为了进位“汉中王”,把手下六十多个元帅上将都调往成都,只留下一个年近60岁的老元帅镇守荆州。也就是说,围绕荆州的明争暗斗,早在关公镇守荆州前就已产生了,并非关公镇守荆州后。

更何况当时关公虽然有权节钺(古代皇帝赋予大臣的一种极高荣誉和权力象征)的权力,按职权可以不经过上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

荆州,在东汉末年分为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七个郡。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家瓜分了荆州,刘备占有关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后又从孙权手中借来了南郡。之后孙刘两家产生冲突,刘备就用长沙、桂阳两个郡抵了南郡的债,因而关公镇守的荆州,其实只有武陵、零陵和南郡三个郡。

荆州东临江汉平原,西接巴蜀之地,南濒江南水乡,北靠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公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可不过几月,大本营荆州就被东吴吕蒙带兵偷袭。

正在北伐襄樊曹军的关公,无奈撤退到麦城(今湖北当阳两河镇境内)。麦城是一座小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公企望在这里稳住局势,等待援军,再把荆州夺回来。麦城失陷后,关公无奈仅带十余骑突围至临沮(今湖北襄阳南漳县境内)时,遭遇吴军潘璋部将马忠埋伏,与长子关平及都督赵累,一同被杀害。

据查,在西晋初期陈寿编撰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的200多种魏晋杂史、杂著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料中,都没有把荆州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关公“大意”的记载。“徐公明初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和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两篇主要记载襄樊之战、荆州失守、麦城惨败、关公临沮遇害的文字中,不仅没有“关公大意失荆州”的言辞表述,并且还阐述了荆州丢失的诸多背景和原因。

“关公大意失荆州”,可能是一些人看了《三国演义》后“发挥”出来的。但历史告诉我们,襄樊之战中,关公从大胜到惨败,直至痛失荆州、败走麦城,绝非关公“大意”而为。

一、《隆中对》战略出现失误,甚而失策,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一个原因